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变*

□ 陈正良 王宁宁 薛秀霞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国际、国内政治的演变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国内政策的变化调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调整,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随着这一进程起伏消长,经历了一个变化演进的过程:从建国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国虽弱而国际话语权表现特殊的时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8 年国力渐强而国际话语权未能相偕与进的时期,再到近些年来国际话语权意识的增强与话语权的趋升,中国当前越来越具有了国力条件和基础去获得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力,但对自身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必须保持一份必要的冷静与清醒,充分全面地认识其中面临挑战的长期性、艰巨复杂性。

关键词 软实力 国际话语权 硬实力 国际关系

作者陈正良,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宁宁,宁波大学硕士研究生;薛秀霞,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

DOI:10.14167/j.zjss.2016.06.004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本质上体现的是一国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影响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说话的有效性和威力(影响力)"①,构成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曾长期领先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但明代中叶之后,由于统治者世界眼光的失落,逐渐陷于固步自封之中。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落伍者,也就难以在此后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占据要角,自此,也掀开了近代中国悲情的一幕。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后,中国更是逐步沦为国际社会的边缘化角色,主权和国家尊严饱受践踏,国际话语权更是几近于零。直到 1945 年二战结束,才重获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才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始了谋求国家自强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也开始了一个主权大国从初入国际舞台、参与国际事务,进而逐步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参与者、改革者和建设者,并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角之一这一国际参与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伴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调整,伴随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和国家发展所需的重大政策调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调整。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在这一进程中,随之起伏消长,经历了一个变化演进的过程。

一、国虽弱而国际话语权表现特殊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

一国话语权大小一般与其经济、军事等硬实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课题号 12BGJ004)、"软实力与宁波区域发展"文化创新团队与宁波大学软实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之一。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力的强弱有密切的关系,但也并非总是完全对应,同进共退。已有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硬实力相对确定的前提下,通过对其已经拥有的有限实力进行合理整合与有效运筹使用,也可以因此获得超越于自身硬实力之上的话语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力基础薄弱,国家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探索并坎坷曲折的过程。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家发展振兴需要经历较长期聚精汇力的奋斗才能积累起相应的国力。在这一探索奋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和挑战,在捍卫人民民主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道路上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业绩成就。然而,由于国内外、主客观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已然展开的国家建设进程也常常被国内外形势发展而引发的各种状况所扰乱而未能正常延续展开。十年"文革",更是使国家陷入长期动荡。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国家亦终未能在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总体上发展出与一个大国所相称的实力,而且彼时国家基本上处于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或敌视、或无外交关系、或无正常人员交往的隔阂状态,并且被排除在当时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但是有一个值得充分肯定和令我们自豪的方面是,中国通过对自身有限实力的有效充分运用,在冷战复杂的国际情境中,在某些方面曾有过一些醒目惊世、敢于迎战最强大对手的作为,大开大合印象深刻,使得国际社会始终无法轻忽中国发出的独特的声音,无法忽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存在的这一巨大事实,中国也因此在这一时期在国际上拥有着并不显弱的特殊的话语权,中国说话,很多情况下世界常常能给予一份特别的关注。此期间,中国还表现出了一份独特的理念贡献能力。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中国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此后就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 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亚非会议上,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的主张,已对国际关系运行几十年的实践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70 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后来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被写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学的教科书中;"毛泽东思想"对于西方左翼力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曾经一度还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来源;毛泽东的著作也一度在许多国家流行,甚至还被美国总统肯尼迪摆上了他的案头,虽然毛泽东曾经数度狠狠教训过美国,但自罗斯福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多予以了极高的评价;中国当初响亮提出的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张也曾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的响应。为了维护自身原则立场、争得平等地位,捍卫话语权,60 年代中国还一度与苏联展开过著名的中苏大论战。70 年代,中国有效利用当时国际矛盾,纵横捭阖,确立了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发言权。也正是中国的话语力量以及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呼声要求,在 1972 年,尽管面临政治操作能力超强的美国的百般阻挠,但第三世界国家最终硬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了联合国,而且还是一个常任理事国。而此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长期徘徊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国际议程设置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权力。此后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提出的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原则被苏联全面接受,等等。当然,从总体上看,建国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这段时期,由于缺乏强大厚实的国力支撑,终究话语力量有限,国际话语权也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特影响上,而无论在作为获得国际话语权基础条件的话语平台建设、技术条件等硬件设施,还是在话语内容选择设计、话语表达技巧把握、对话语对象的研究、话语队伍的建设等软件方面,都受制于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受制于当时观念思维和视野的局限,并未能形成一种自觉的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意识,也就不可能有对此去作一种战略上的整体筹划,更多的也就只是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作为现实国际体系的弱势者反对强权政治、维护基本的国际公平正义和自身国家利益所作的勇敢的抗争努力。

二、国力渐强而国际话语权未能相偕与进的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8 年)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发展之路绝非直行坦途,但中国在探索中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总体上实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壮大,被西方日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益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然而,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排序一直在稳步攀升，但是在诸多国际事务中(特别是经济事务中)却未能同步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其间存在相当的落差。前面所述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存在的有关要获得国际话语权必须的一些硬基础软条件的建设、以及在战略意识和行动筹划上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并未能得到应有的较大改变。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与自身国力发展的未相偕进，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综合国力成长中的一只“跛脚”,也构成国家利益拓展、甚至国家安全上的一大软肋。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到90年代初一度濒临崩溃,再进入西方对中国竟合与阻遏同存的常态关系,中国话语权的提升既受限于自身国力和“韬光养晦”的策略考量因素,客观上也严重受限于西方基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施与的强力抑制打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一种幻想，期待中国有朝一日在西方的影响下，朝着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实现“和平演变”,由此,“合作”与“诱变”可以说是此一时期中西方关系的主基调。20世纪90年代之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造成的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调整,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在此情形下，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取得更加强势的主导性地位。由于中国对自身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坚定坚持,与西方的“友好”关系一度濒临崩溃，西方对中国的打压也一度成为主流,各种贬损和攻击中国的言论轮番扑面而来。那些赋予了西方特有内涵的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观念主张,以及所谓“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民主和平论”、“失败国家论”等等政治论调,借由其强大的媒体传播力量,几乎成为霸权性的国际话语。而中国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基于促进人类和平和共同发展目标和公正合理原则之上的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推进世界多极化发展理论、国际关系民主化理论、和平发展理论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等,由于在国际上发声的音量不高、话语传递的渠道途径有限，并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应有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西方,中国的话语影响力更是微弱。不仅如此,中国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到具体的政策行动，更是不断地遭受西方话语的大肆贬损和攻击,其中既有“中国崩溃论”等各种唱衰中国的论调,也有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和各种别有用心的“捧杀中国论”等,以其话语强权对中国进行肆意的描摹，塑造出一个西方哈哈镜下的变形的丑陋的中国,但凡涉及到中国的问题,情况常常如此。

从中国自身此一时期的现实状况来看,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重心明确,开始更多地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有意保持着低调和守拙的姿态。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执行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外交战略,坚持奉行“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政策方针,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不争论”、“不当头”的策略，极力体现低调不揽事。此期间,中国虽然已逐步成为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而且在绝大多数国际多边外交活动场合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参与，但由于中国在国际议程设置和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主动性要求不够,以及总体能力上的欠缺,因此中国在大多数国际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场合的话语权诉求表现均显庸常。虽然一般也不缺席,常常也是只见其人,少闻其声,话语缺失。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始而越来越多地参与进了原本按照西方价值体系建构的国际体系，在受到国际上各种势力的冲击和各种情势出现巨大变更的情况下，中国的话语权也开始遭遇一些以往不曾有的矛盾和尴尬，其中就包括中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也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的外交方针从原来的“一边倒”转向“两个拳头打人”,在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中国曾长期紧密依靠和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坚定不移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和各种合法权益，由此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和友好合作。在整个世界实际上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势下,中国审时度势,以自己鲜明的外交立场,倡导反帝、反殖、反霸,团结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由此使得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享有重要的影响力，并因此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一员和代表在世界上获得了很大的话语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权。但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局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南北对话逐步陷入僵局,南南合作也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受损严重,并形成日益严峻的债务危机、粮食危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大量的贫困人口。冷战结束后,原有两大阵营对垒格局伴随苏联的解体而进入新的格局转换时期,曾经的两大阵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竞相争夺、拉拢利用的局面已然不存,原来强调彼此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是走向日益严重的分化,有的发展成为新兴大国,大多数则未曾有所起色,有一些国家甚至陷入国内纷争不已的乱局,以往的团结局面走向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国强调自己与第三世界国家是"同一条战壕里面的战友",也难以如同以往那样"登高一呼"而有效动员起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行动。不仅如此,随着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国际地位不断抬升,从国际社会特别是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眼中看来,中国已不再是原来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一员。然而,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现实,中国的人均发展水平实际上还远不如发达国家。这样便产生了新的危机——"中国在外表上越来越具有大国特征和在实质上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反差,使得中国在向全世界表达自我的时候遭遇了话语断裂的危机"②。因而,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常常不仅得不到西方世界的认同,甚至也常常得不到发展中国家对自己曾有的信任,而且也令自身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之境。

此外,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加深,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同时被卷入到错综复杂的全球化体系中。在此过程中,双方合作程度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彼此在基本国情、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根深蒂固的歧见,话语权的冲突较量时常冲击着彼此关系发展的全局和整个过程中。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所占优势和传媒舆论上的强势,几乎主导了世界上各个方面的话语权,中国常常也由此落入一种"被定位"的境地,致使形形色色的对中国误读流行于世。对于这些误读,中国在以往表现出的多为被动的说明解释,似乎并没有多少能有效应对的策略来把握话语主动权,无论是在战略意识、战略目标,还是在有关国家形象的定位上。

如在对外战略意识上,我们一直缺乏自觉主动的筹划准备意识。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以往常常习惯采取的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式的被动防御模式的策略,习惯性的思维总是"别人不要对我做什么",而不是"我要做什么",或"我希望别人做什么"。比如在中美两国关系的互动处理上,我们常常只是停留在美国"不要对台军售"、"不要干涉西藏问题"、"西方不要干涉中国人权问题"、"不要对我说三道四"等。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思维则是其一以贯之的主动型的进攻模式,即"中国要做什么"、"中国不能做什么",比如要求中国增加军费透明度、要求中国开放互联网自由、中国的人民币要升值等等。美国自己的事情并不一定做好,却习惯于管别人的"闲事",不仅要说三道四,还要说五道六。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交锋的结果常常是:美国的主动进攻赢了中国的被动防御,最后往往是美国要做的事情中国通常没有能够阻止,而对于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做的事情,美国为了从中国获得一些好处,可以说三做一,作为交换和要价筹码,有些可以暂时不做,但是过不了多久最终还是会做的。许多情况下,这也成为美国要挟敲诈他国的一种惯常模式。中国与其它西方大国的交往互动常常也大抵如此。中国的出发点——被动防御模式,对于西方国家的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模式,很多情况下,未必不是一种情非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被动防御外交显得过于脆弱,而且是建立在中国实力不如人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失语也就成为必然的了。如能实施攻防结合,在搞清自己的长处和强项与别人的短处和弱项的基础上,在防御同时不时搞点不对称的反击甚至主动出击,扬己所长,击其所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挫其气焰,在总体实力尚不如人时,也不致话语权失落太多。

再如在对外战略目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战略化模式的,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西方的理想、价值观、生活方式是普遍适用的……理应在全世界获得推广"③。在这一核心理念支配之下,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变化是服从于西方的总体战略目标的。但是,中国可以说在战略目标上是模糊的,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行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计划。事实上,这恐怕也是片面注重“韬光养晦”所带来的结果,而在“有所作为”上主动性不够,更多限于不惹事、不出事,被动反应式多,主动作为、为他人设置议题的少。然而,随着中国日益发展,特别是当中国的经济实力日趋占据世界靠前位置后,中国的一言一行就更为广受关注,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势将需要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责任担当,义不容辞。更何况对外部世界一些国家来说,中国发展起来后将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会做什么?有没有危险性?这些也是他们心里不踏实的地方,而这些也是埋头“韬光养晦”所无法自动化解的。特别是当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使得国内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在能源需求、气候、金融汇率等领域对国际社会已产生越来越大的实际影响,一些国家又不时别有用心捣鼓“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时,如果我们还回避这些现实问题的话,将只会变得越来越被动。

另外在有关国家形象的定位上,在西方世界建立的“他者观”语境下,经由一些西方媒体长期的抹黑鼓噪,中国已然被塑造成了一个没有言论、宗教自由,人权受到严重压制的政治专制国家,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也因此流行于世。正由于西方需要主动建构“他者”,将异质的非同类国家推开,从而凸显自己的现代性和现代化,中国才会遭遇此境况。正如美国每年一度搞的国别人权报告,给许多国家人权状况以恶评。虽然不能说被指责的国家没有人权上的问题(实际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自己同样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人权问题),但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建构“他者”的需要,从而将自身的一些问题转移到他者身上去,同时以此显示自身的文化、价值的优秀,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维持自身强者形象。面对西方的这种“他者”观和此类蓄意加诸于身的定位,中国暂时没有太多有效的应对办法,目前阶段所做出的应对方式似乎主要是依靠自己拥有的媒体那声小力薄的宣传和难以通畅进入西方主流媒体而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国内受众群的影响有限的自我辩白。也正是由于西方文化这种强势影响,不少国人都在外来现代性的影响以及外来的“他者”观的刺激下,也逐步陷入了西方的“他者”观之中,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主体自觉自信以及一种主动的对外表达。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原则在一段时间更多地强调了前者,更多地被理解为中国在遇到与本国利益关系不是太大、不是太密切直接的国际矛盾和国际冲突时,尽量不当头、少出头并低调面对,中国因此常常在许多国际事务处置中和大多数的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被动参与者、一个沉默寡言者或中立弃权者。中国“有所作为”的领域,一般也仅局限于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度很高的事务方面。这样执行实施的后果,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它暂时使中国回避了许多现实的国际矛盾和负面事件的影响,为中国在一些与自己不是直接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中摆脱了一些被动和牵累,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工具和解释理由。其次,需要清楚的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许多矛盾和问题是不应、实际上也是无可回避的。因此,这些年来,如果单从已加入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的数量来看,应该说中国已完全加入现有国际体系,但从中国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及实际的政治操作能力来看,中国的参与质量并不高。第三,从外交实践情况来看,过于强调“韬光养晦”原则将使中国难以获得稳定的盟友支持,从而也将影响到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上的提高。特别是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在强化“盟约”作用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第四,过于强调“韬光养晦”原则也不太有利于中国增强国家战略信誉,失去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道义与责任担当,从而有碍国家国际动员能力的提高。因此,虽然中国今天在执行这一政策时,仍有许多事不得已的因素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但从长远战略计,中国必须在今后,更主动积极地逐渐扩大“有所作为”的内容和范围,从而使之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作为相适应,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整体战略筹划,虽然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硬实力大幅提升,但却在向世界提供具有引领作用、普遍意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概念、普适性价值观等方面,与自身应有的大国国际地位和实际国力还颇不相称,此方面的进出口严重失衡,西方文化、思想理念轻易在中国实现攻城掠地,中国的文化输出影响与之难比伯仲,甚至在有些方面尚不及在综合国力方面当时尚处于弱势状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实际的状况也表现为,受苏联、东欧解体造成社会主义处于颓势等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种现实的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国际话语领域在许多方面常常处于守势。面对西方在有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主、人权、价值观、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政策等方面咄咄逼人的话语攻势，通常也多以“中国特色”、“中国具体国情”或“民族性特点”等类似的“特色”话语来应对抵挡某些国际强势话语的挑战冲击。这样的做法虽然一时也能使中国比较理直气壮地化解这些挑战冲击，但这反而也对中国构成了某种束缚，拘束了中国难以向世界贡献普适性的理念和话语体系。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在此期间与整体国力增强的现实未相与偕进现状，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现存的国际体系安排是“二战”遗留的强权政治的产物，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先天的不公平，并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比较多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由于众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新中国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大多采取不信任、不参与甚至抵触的态度。由于战后冷战格局长期的基础性影响作用，加上国际上新闻媒体的资讯来源及资讯解释权长期以来基本上被西方国家所垄断，全球大部分地区约 80—90% 的资讯由西方通讯机构所提供，而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在全球信息总量中的占比甚少，而能有效地传递到世界、源自中国的信息更少，致使在全球话语权格局中，西方长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当然，制约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如国家实力不强的基础性因素的制约使得我们必须更多的将精力优先用于发展自身；此外，国家对外战略中公共外交战略筹划上的疏缺，以及在话语内容、话语运用、话语平台建设上存在的诸多不足与问题等。

因此，在此背景下，积极争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既是应对现实的需要，也是大国战略的题中内涵。这其中特别需要消除的一个误区就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加，自然能够带来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提高。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权力要素，彼此间的可转换性并不强。例如即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愿意多出钱，西方国家也并不因此愿意轻易稀释自己在 IMF 中的份额。因此，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中国不应抱任何幻想。更何况，国际话语权的提高，不仅在硬实力基础，更主要决定于思维、战略、文化土壤，还有战术技巧。

三、近些年来国际话语权意识的增强与话语权的趋升(2008 年以来)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走向盛世的一个新时期，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至 2008 年，中国国力已实现飞跃性的发展，渐而成了全球任何国家无法轻忽小觑的强大存在。但就现实的国际秩序的建构与改造来说，中国在以往的很长时间里基本上只是个“旁观者”，最多也只是一个在有限领域、有限层面的“参与者”，而非一个重要的“决策者”、“主导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向世界各地扩展渗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由此而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国际话语权意识也因此在不断增强，中国已开始影响并已部分参与重构不同议题上的国际话语体系。自冷战结束以来，围绕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美、欧、日出于其列强本性和维护自身利益优势的惯性，各打算盘、同声异求，各自提出了一系列谋求建立美 、欧、日“三极”主导下的、以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和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主张。中国则坚持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原则，并强调国际新秩序应体现：“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④并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不懈地努力倡导践行，中国也在冷战后西风正劲的国际环境中，表现出了一份独特的原则坚守。使得在现实世界的话语体系中，不只是西语喧哗，也常常能听到一种不一样的“中国声音”。

实际上，伴随中国在经济上节节趋前、不断实现新的超越，从而成为主要经济大国以后，中国便不由自主和不可逆转的被推到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伴随着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在美欧国家经济的哀嚎声中，中国由于相对稳定的经济以及丰厚的外汇储备更是被国际社会推到了主要“拯救者”的位置，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社会殷切地表现出对“中国责任”的高度期待。在近些年中，中国领导人出访也常被一些受访国视同“大施主”驾临,受到极尽尊荣的隆重接待。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确已今非昔比，一些过往通常表现傲慢的西方大国也竞相摆出拉拢讨好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一系列的变化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事务中能够起到一定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中国自然也已经意识到了国际话语权争执中的中国失语现象不可能长期延续，已开始逐渐的改变往常对于国际话语权过于谨慎自制的态度。2008 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要“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⑤,2009 年 7 月,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⑥,应可被视作是中国政府强调国际话语权的明确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在国际关系处置和运作时,中国更加重视自己作为大国对有关问题表达应有的态度看法。

回顾 20 世纪的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可以说,西方几个主要大国一直掌控着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上世纪 70 年代在为应对接连发生的“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召开的美、日、英、法、意和西德六国首脑会议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八国集团”,其成员国之间的默契,一直以来是许多国际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西方发达国家更是为此欢欣鼓舞，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表达也由此声高八度。只是一番狂欢之后,伴随着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主要的西方国家日益陷入霸权主义政策实践的陷阱和无良经济、金融政策带来的经济危机,现实的窘境,才使他们的理智恢复些许的清醒。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大旗不倒的大国,凭借着骄人的实际发展业绩和良好的发展态势所提供的有力的话语底气支持,在新世纪初,在许多领域已体现出国际话语权日渐增强的势头。

如果说上述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实力增强后的自然而然发展的客观结果,那么 2008 年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则使得一般中国民众都受到出乎意料的强烈刺激，也使得中国民众在国际话语权问题上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发生在西藏的“3.14”事件及其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和中国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在一些西方国家的遭际及藉此对中国的抹黑,不仅激起了中国民众(包括曾经对西方国家抱有相当好感的人们）强烈的厌恶与反弹,也唤起了中国民间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意识。与此同时,2008 年肇始于欧美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在西方国家无力完全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的无奈中，不经意间帮助抬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如果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西方国家出现的闹剧、西藏的“3.14”事件及其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除了暴露西方国家一些人的狭隘、无知、用心无良，带来的是西方抑制诬陷中国的“有心栽花花不发”的适得其反的效果,那么对于中国来说,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于抬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则无疑是起到了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作用。

受 2008 年肇始于美国“两房”危机而迅速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西方国家一时间深陷经济衰退泥潭而自拔维艰。作为祸端肇事者的美国,其自身经济也深受重创,其国际霸权地位也因受此影响而被削弱；欧盟更是遭遇了其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在谈论有关谁须对本场危机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西方“七国集团”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歧并出现了裂隙，部分政界人士和媒体甚至把矛头明确指向了美国。此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此次危机尽管从大背景看,有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累积因素，但其直接原因显然主要是源于美国的那种卯吃寅粮的信贷消费模式和金融监管松懈而引发。

西方国家显然也清楚,要度过危机,发展势头正盛、手中掌握着巨额美元外汇和美元资产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无疑将能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不得不借重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发挥 G20 在其中的作用。G20 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提升,表明国际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西方大国难以再如以往任意操控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完全解决业已发生的严峻问题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则无疑得到抬升。中国作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G20 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成员，其国际话语权在此背景下无疑自然得以提升。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确实也以自身的实力和行动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9 年 4 月初召开的伦敦 G20 峰会，被称为“国际社会应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在会上提出的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张，为峰会取得积极务实成果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有力提振了国际社会应对这场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中国还在伦敦峰会之后，承诺购买约 500 亿美元 IMF 债券。中国的这一系列努力，无疑对于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都有积极意义。从实践的情势发展来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受到瞩目，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

2009 年 9 月召开的匹兹堡峰会则再次凸显了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在该次峰会上，中国关注的议题都无一例外得到了体现。例如，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领导人声明》中，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提高 5% 以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增加至少 3%的投票权；同时，还宣布 G20 将取代 G8 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G20 的这一成功升级，可以看作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格局演变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台阶式跃进的成果表现，是一个国际权力从作为长期主导左右世界经济发展步伐和走向的旧贵族俱乐部——西方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分流再分配的阶段性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影响力得到提升的最直接的成果体现。同时也表明：自此之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将进一步增强；以往那个少数发达国家完全操控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将发挥更大影响力；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最主要一员的中国已开始从原来的世界经济规则的“旁观者”逐步向规则“制定者”身份转变。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内政外交双修，兼善天下。一项项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兴利除弊的改革举措连番出台，国家发展治理呈现良好态势，外交韬略作为大开大阖，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主场外交频频发力，“一带一路”战略全面铺展，保持定力，积极有为，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力度影响着当今世界。

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变化提升，中国当然还须保持一份必要的冷静与清醒，必须充分全面地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及面临的挑战的长期性、艰巨复杂性。权力的增长，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也将随之增长，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内部困难；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将构成重大挑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国际上一些势力仍在利用民主、人权和宗教问题抹黑中国，国际舆论中“国强必霸”、“中国威胁论”等仍会不断兴起，仍有很大市场；外部战略防范和牵制、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依旧严峻。坦率地讲，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上升到一个理想的程度。但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有一点是可以充满信心的：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坚定走下去，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将肯定不会是中国，而最终应该是“话语霸权”。

当前，国际社会主要主体间已经发生的力量消长，客观上已经促使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作出必要的调整，在此过程中虽然会充满斗争，但趋势毫无异议也是明显的：代表旧格局既得利益者的力量已难以再继续维护原有的格局秩序，需要有所调整改变，虽然还难以有颠覆性的改变，但至少象中国这样长期以来在国际权力格局中被严重贬抑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获得她该有的基本份额。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国也越来越具有了国力条件和基础去获得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力：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和谐外交的成功实践及信息化时代的技术条件等，都将从不同方面不断推进中国影响力、吸引力的日益扩大，向世界形塑出一个积极进取、日益进步又坚持和平发展、强调合作共赢友好的大国形象，越来越多地引来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和兴趣，这一切将既为中国国际(下转第 79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视村规民约在当前公共规则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传统村规民约在流动性环境下趋于解体,但是与时俱进地修订村规民约依然非常必要。一方面吸收传统优秀村规民约的精华,以此作为现代村规民约建构的文化底色。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当前公共规则重建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上,也不是凭空想象的。传统优秀的村规民约根源于当地乡土社会中,是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处理村民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蕴含着先人的集体智慧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值得我们反复学习与借鉴。另一方面,根据各地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与时俱进地将村民认同的新规则、土办法、新标准纳入到村规民约修订中来。村规民约需要具有民意基础,这就需要动员村民积极参与修订,民主商讨、集思广益。特别要注重发挥乡贤、老干部、文化精英、经济能人、道德模范等在村规民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董磊明:《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

②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1 页。

③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 年第 3 期。

④杨华:《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⑤贺雪峰、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2010 年第 6 期。

⑥[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7 页。

⑦董磊明:《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⑧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开放时代》2011 年第 2 期。

⑨贺雪峰:《论利益密集型农村地区的治理》,《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6 期。

⑩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开放时代》2011 年第 2 期。

⑪陈柏峰:《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中外法学》2011 年第 2 期。

⑫董磊明:《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⑬张良:《文化参与机制: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制度供给》,《学习与实践》2012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 余 越

(上接第 43 页)话语权的提升提供基础、创造条件,同时也为中国的未来留下了一系列需要面对的更多的责任和挑战。

注释:

①鲁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话语权与信息安全》,《求是》2010 年第 7 期。

②赵可金:《中国崛起与对外战略调整》,《社会科学》2010 年第 9 期。

③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198 页。

④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⑤温家宝:《携手开创中俄经贸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08 年 10 月 29 日。

⑥吴绮敏:《第 11 次驻外使节会议召开,胡锦涛要求提高外交能力》,《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21 日。

责任编辑 余 越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urnover cost, I find that minimum wage has two opposite effects on firm-sponsored training. In this paper, turnover cost is employee's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firms implement third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As a result, employees in the same firm confront same wages offered by each firm, yet different turnover costs. Consequently, those who have low turnover costs will take job-hopping, while those with high turnover costs will remain. Because of turnover cost, inner wage should be lower than outer wage and thus minimum wage is first bounding on inner wage other than outer wag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raining will raise workers' productivity and thus their outer wage offers, while inner wage remains on the level of minimum wage. This means training enlarges the gap between inner wage 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gap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wages. The former effect is called wage-compressing effect, and the latter turnover effect. Wage-compressing effect encourages firm-sponsor training, yet turnover effect discourages it. Overall,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training obeys a "U" form: minimum wage first increases firm training, and then decreases it.

Key words: firm training; minimum wage; wage-compressing effect; turnover effect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ng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6)

Chen Zhengliang, Wang Ningning, Xue Xiuxia

(*School of Marxism*,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nd the domestic polic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changing constantlyinturn. Inaccordancewith this process,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experiences ups and down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is embodied as follows: the perio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1980s, featured by the weak country but the special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rom the 1990s to 2008, characterized by the increasing national strength withunmatchabl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the stage of recent years witnessing the enh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wareness and the tendency to the ascent of discourse power.At present,China is increasingly having the national strength condition and basis to gain the due status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should keep in calm and clear mind of the promotion of its ow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should be well aware of the eternality, difficulty and complexity of challenge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Key words: China;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evolution

Influential Differences of Human Capital and Urban Integration on Migrants' Access to the Urban Common Public Resources: A Research Based on Guangzhou Survey in 2012 (44)

Han Fugu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ll migrants'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regime are the same, we chose the two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human capital and urban integration to analyze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to the migrant population`s access to the urban common public resource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stratified sample about Guangzhou migrant population. We fou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human capital of migrants is an first important factor in enjoying the urban common public resources and they are enjoying much more urban public resources who engaged in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company staff than those blue-collar workers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ing line. But compared with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we found that the various indicators of migrants` urban integration are significant in the correlations with their enjoyment of urban public resources.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ructural problems of migrant population`s urban integration degree, rather than simply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human capital, especially the equality in policy-makings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